

社会组织嵌入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刘庆顺, 魏 强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浙江诸暨 311800)

[摘要]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和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也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实践。通过实地访谈探讨了诸暨市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模式,以及社会治理创新取得的成效、经验与面临的新时代挑战。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很难有效、持续嵌入基层社会治理,而且表现为碎片化参与趋势。基于社会组织通过基层政府“借力”“接力”等方式形成与运行的逻辑,提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包括政治嵌入、制度嵌入、关系嵌入和情感嵌入等多方共赢的社会治理合作模式。

[关键词] 新时代“枫桥经验”;社会组织;社会治理;嵌入理论

[中图分类号] C916.1; D630; D0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5)23-0109-04

doi: 10.3969/j.issn.2096-711X.2025.23.036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成果,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社会治理方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并完善以党组织为领导的将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优化社会治理体系,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培养和发展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是新时期“枫桥经验”最大的特点。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诸暨市被列为浙江省创新“五社联动”机制试点单位、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改革创新试点单位,形成了诸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较为典型的模式,但也面临着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挑战。因此,社会组织如何成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如何成为构建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主要参与者是一个重要课题。

一、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诸暨模式

浙江省诸暨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曾被中央领导批示肯定。诸暨市也连续多年将此列为政府工作的重点,探索出了具有党建引领、项目驱动、政府支持和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组织发展和参与社会治理的“诸暨模式”。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诸暨模式,就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多元主体的协作、数字化赋能及专业能力提升,构建以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为主的和谐稳定社区模式,从而充分发动、组织、依靠群众。其核心特征概况为以下几点:

(一) 坚持党的领导总揽全局

诸暨市社会组织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参与基层治理中,坚持发挥党组织总揽全局的作用,确保所有活动都在党的领导之下有序开展。自2018年被确定为全国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市以来,诸暨市始终紧扣“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凝聚群众、引导群众”的总目标,以建设强三级实践阵地、做实五大实践内容为抓手,不断把文明实践实践活动引向深入。同时,诸暨还特别注重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广“先锋微家”“亮旗”等活动,充分发挥了1000多家

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优势,引导矛盾调解、心理咨询、法律服务等专业人员参与到文明实践中来。

(二) 创新多元协作模式引领共同参与

诸暨形成了一个包含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以及普通居民在内的多方共同参与构成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网络,其中专业社工凭借专业知识和技术优势,在协助个体及家庭解决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志愿者深入群众中,调解矛盾,解决潜在社会问题。大量的公益组织的志愿者穿梭于社区网络中,从事送菜送饭、发放传单、设卡登记等工作。此外,还有像“环卫工人爱心早餐”“小区车管家”等一批由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打造的精品志愿项目服务社会。

(三) 数字化赋能灵活高效

诸暨积极探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科技手段来优化服务流程,最大限度地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例如,搭建诸暨市社会组织党建云,全市社会组织服务实现网上一键直达,时刻更新社会组织动态,打造集招募注册、项目发布、供需对接等功能于一体的文明实践网络平台,实现了精准的服务配送。

(四) 引育结合提升社会组织专业能力

为鼓励更多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才加入到这项工作中来,诸暨市定期对现有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例如,诸暨市以社工学院成立为基础,加强对基层工作者的教育培训力度,提高了他们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意识,并积极引入外部专家资源,为当地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专业团队。

(五) 突出“预防为主”和“综合治理”原则

对于已经出现但尚未造成严重影响的问题,以枫桥大妈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及时介入并进行调解处理,防止进一步恶化,是社会组织践行预防为主理念的主要方式。这类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家庭内部的小摩擦、邻里间的轻微争执等情况。此外,社会组织还积极开展法律法规宣传、心理健康讲座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提高居民的安全意识和个人防护能力。综合治理是系统性思维的应用,即从整体出发考虑问

收稿日期:2025-9-23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项目“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研究”、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科研发展基金项目(项目编号:RC2021E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庆顺(1971—),男,山东兰陵人,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通信作者:魏强。

题,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最终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诸暨模式中,社会组织一方面采用跨领域协作形式打破传统社会组织各管一摊现象,促进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另一方面,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如通过开展“最美家庭”评选等活动,表彰那些在生活中践行美德的家庭和个人,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二、新时代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与挑战

(一)基层党组织引领功能与效应的弱化

目前,基层党组织存在一定的权威和执行力弱化问题;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出现脱离群众的“悬浮”现象,甚至使一些基层党组织出现了弱化、虚化、边缘化的趋势。然而问卷调研结果显示,社会组织基层党建“堡垒指数”还是比较高的,包括组织建设、组织活动等都比较活跃,不过与访谈结果相比较又有很大的出入,即访谈中普遍认为党建引领的作用比较弱化。

【NC001】问:党建在义警站中的作用是否比其他社会组织发挥得更加明显?答:不明显。提出过党支部书记还是义警站队伍里的,不要是公安里的意见,但公安未放手。存在偏向于行政化却又不提供相关帮助的现状。公安每年有一笔维稳经费,但未放在义警站工作上,多是空洞的。

【DT001】问:在党建参与过程中,社会组织是否会失去灵活性?答:有相对的行政影响,但能保障自主性,如调解家庭矛盾等。政府也希望壮大社区组织,在这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有行政影响。

【DK001】问:党建在社会组织活动中起到什么作用?答:有一个保证公信力和稳定性的党建引领方向。但是政府重视程度也不高,项目考核分数越高越能引起政府的关注,在社会组织参与的服务项目中会辅助政府中心工作。

调查发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对社会组织作用发挥不明显(如平安类社会组织大多反映了党建未能有效发挥在社会组织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救援类组织的访谈中,提出党建增强了队伍建设的凝聚力,如组建工会、妇女委员会等。但党支部并未在组织发展中起到资源开拓者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党建在组织发展中的作用。此外,在对大量小型社会组织聚集的服务中心调查走访中,指出党建在小型社会组织发展中作用有限。这一方面是由于这类社会组织普遍体量小,党支部建设困难。另一方面,这类社会组织对党建工作顾及不上,生存压力沉重。

【GX001】问:党建在救援队的工作中起到什么作用吗?答:党建作用不大,救援队属于街道党委成立的良心组织。对于诸暨的社会组织来说,贵兴救援队早就成立了党支部,又成立了工会委员会,在去年成立妇女委员会,在党建里是三会齐全的。一般像救援队这种组织,党建提供的资源还是比较少。

【YJY001】问:党建在社会组织协作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大吗?答:党建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少。各社会组织自身都存在生存问题,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关系。我认为如果社会组织没有生存压力的话,会更容易进行合作,社会组织肯定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的生存问题。

(二)社会组织的类型结构和有序参与治理的挑战

当前,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还面临很多挑战和难题。其中,条块分割、无序参与、群众参与不积极、“自、法、德”三治合一不成熟是当前基层治理体系存在的主要问

题;因此,只有完善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才能将条块分割的基层治理制度彻底落实到基层。比如,受2019年诸暨市推行“1+5+X”政策影响,社会组织数量迎来井喷式增长,到2024年社会组织在册数量达到5849家。根据市民政局提供的活跃名单现实,有207家社会组织广泛活跃在社会治理的各领域。但从活跃名单中发现,其中63家是直接注册,没有业务主管单位,31家业务主管单位选择为民政局,二者占比达到45.4%。这表明诸暨社会组织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结构性问题,大量社会组织找不到合适的业务主管单位。同时,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资源竞争关系。为了能够在竞争中获取优势,社会组织容易形成分散、孤立的封闭竞争环境,阻碍资源共享和信息流动,也难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这种情况下,小型或新兴的社会组织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进一步加剧了资源获取上的困难。访谈对象提出社会组织面临社会认同感低、资金缺乏问题,部分小型社会组织甚至无法解决专职人员工资问题。即便部分社会组织能解决工资问题,但薪酬待遇相对较低,难以吸引高水平的专业人士加入。调查中发现,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短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限制了组织的专业化发展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ZX001】缺乏专业化力量。志愿队在疫情期间发展起来,成员复杂,多是社区招募、志愿者自愿加入、返工志愿者、居民、党员、物业居委会等,以社区为主导。

【YHC003】志愿队内有党员、律师、教师等专业人士,但整体素质不均匀。专业化力量也较弱。

【YJY003】组织成员缺乏,社会认同感低。资金缺乏,专职人员请不起,专业化力量不够多,专职人员不多(专业度不高)。

因此,社会组织与公众间的互动反馈单一、机制不畅,社会组织之间存在各自为战、力量分散的现象,导致社会组织人才与资源参与的碎片化。大部分社会组织的专业人才匮乏,尤其是社区积极分子与精英人才缺乏,削弱了发展潜力。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使得部分活跃且成效显著的社会组织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而一些小型或新兴的社会组织则面临资金紧张、物资匮乏等问题。

三、基层社会治理中嵌入社会组织的机制和类型

“嵌入性”原指各经济体嵌入社会关系和体制,没有一个由市场自主自发完成调节的全部经济体制。现代性社会系统需要建立多元主体整合的社会治理机制,“双向嵌入”是指一方面在国家体系中深深嵌入以社会组织为中心,在获得资源支持的同时追求“强正当性”;另一方面,通过动员活动,力求把群众的认同与支持建立在根深蒂固、切入于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组织来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具体来说,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双向嵌入,是指治理主体与客体从权力、制度、关系、情感等维度的双向嵌入与互动。

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视角,本研究通过政治嵌入、制度嵌入、关系嵌入和情感嵌入这四种类型分析双向嵌入关系。其中,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建设相关研究方面,政治嵌入在我国是比较多的。把社会组织主动参与到党建活动的行为一般称之为政治嵌入,即社会组织积极融入党的政治环境中去。政治嵌入是一种综合性的嵌入策略,旨在使非公权力组织主动或被动地承担一定的政治责任,从而成为国家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因此,在其原有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赋予

其政治性价值取向,使其受到市场规则和社会规范以外的政治规范的约束。而体制内嵌则是指被其外部制度环境所引导、推动或制约的内嵌主体的行动,所以这种内嵌方式往往与制度经济学联系在一起,它强调的是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同时,制度嵌入也被用来指代国家对社会事务的决策,对被嵌入主体原生规则中的行为,以决策为基础制定的制度规则进行干预。关系内嵌是指以关系紧密度的强弱来衡量个体经济行动和经济行为效果的一对一双边人际关系的影响。另一个角度嵌入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嵌入,意为在追求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的目标激励下,将有关获得社会资本的社会交换博弈嵌入到其他博弈关系中来,促成人们其他博弈关系的实现,社会嵌入到社会资本中去。志愿服务、慈善服务、义工服务等社会组织具有嵌入社区情感治理的优越性,通过“情感心智—情感关系—情感氛围—情感空间—情感能力”五重情感嵌入机制。情感治理是一种注重彼此信任和相互关爱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慈善服务与情感治理在价值追求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情感治理在基层社区具有独特的作用。

四、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诸暨市坚持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引领,通过整合集聚、孵化培育、规范提升,构建“一核引领、双轮驱动、三方合力”的社会组织发展模式,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创新推进“五社联动”和社会组织发展改革省级试点工作。诸暨市连续多年将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列为政府工作重点,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党建引领、项目驱动、政府支持和社会广泛参与特点的社会组织发展之路。基于嵌入治理的视角,提升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建议如下:

(一)基于政治嵌入视角的建议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基层党委的大党建领导功能。坚持在两新工委领导下,用好数字技术,提升组织体系建设效能,完善社会组织内部党建和基层党建协商机制,建立多层次联动的大党建格局。二是以落实党建责任为抓手,抓好社会组织党员队伍。明确社会组织承担党建工作的政治责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尤其是流动党员的服务管理,推动党员教育内容、师资力量、阵地建设,健全党建工作全周期管理、全过程监督机制,实行容错纠错保护、奖励关爱机制,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切实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抓出成效。三是以党的建设为统领,构建具有前瞻性的社会组织发展战略框架。围绕社会组织发展,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明确社会组织角色定位、发展方向以及设定具体目标。如店口红帽子坚持党建引领,明确自身特色,逐步发展成颇具当地影响力的社会组织。

(二)基于制度嵌入视角的建议

一是为社会组织提供清晰的行为准则和服务标准。首先,简化注册流程并放宽准入门槛,缩短审批时间,为社会组织创造宽松的发展空间,鼓励更多类型的组织加入进来;其次,善用信息化手段,完善沟通机制,推动不同主体信息共享与协作。二是以项目为先导,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构建以项目带动为主、政府资金援助为辅、标准层级递进激励机制,通过项目引导社会组织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吸纳社会慈善资本

更多进入的激励机制。三是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全过程透明化绩效评估和正反馈循环。首先,完善社会组织考核管理机制,建立严格双向监督的项目招标制度和评审体系,规避寻租风险;其次,推动社会组织公开其运行状况和治理情况,建立“城市留言板”“民情在线”等数字平台,畅通公众监督渠道,形成正反馈循环;最后,引导社会组织健全内部自律自查机制,提高风险识别与防范能力。四是持续优化政策环境。为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政府相关部门应出台更加完善的系统性政策措施,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场地租赁减免等,降低运营成本,激发活力。

(三)基于关系嵌入视角的建议

一是社会组织发展坚持需求导向。从居民真实需求出发设计服务内容,用好“浙里办App”“民情在线”“三服务”小管家等数字平台,真正做到“百姓呼,我应”。只有当提供的服务切实解决了居民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时,才能赢得长久的信任和支持。二是支持社会组织,大力塑造“非正式权威”。引进乡贤等本地人才进入社会组织,营造良好治理氛围,使居民更加信赖并愿意参与到社会治理活动。三是构建稳定长效的专业人才培育机制。以诸暨社工学院为依托,定期或不定期开设各类培训班、讲座,线上课程等方式,有计划地培养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人才、领军人物、骨干人才及专家团队。

(四)基于情感嵌入视角的建议

社会组织对社会资本层次的提升作用巨大,对和谐社会的促进作用也很大。第一,发挥专业优势。社会组织通过个案工作方法直接介入个人生活领域,或是利用小组工作的形式创建互助互动的空间。这些专业的干预措施有助于提升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促进了社区整体的社会资本增长。第二,合作治理模式的创新。鼓励更多的社会团体联合会、法治驿站、志愿法律诊所等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社工、社区义工、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不断迭代升级,推动基层治理形成责权利统一的共同体意识。第三,搭建一体化交互平台与线下服务体系。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交流平台,鼓励居民表达意见并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来,让不同利益相关方能够实时沟通交流,提高决策效率和服务响应速度。第四,注重长期关系的培养。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团体在当地生根发芽,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参考文献:

- [1]舒洪水,宋磊.“枫桥经验”视域下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路径[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9(6):105-113.
- [2]王浦劬,汤彬.基层党组织治理权威塑造机制研究——基于T市B区社区党组织治理经验的分析[J].管理世界,2020,36(6):106-119,248.
- [3]宋世明,黄振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J].管理世界,2023,39(1):28-41.
- [4]宋世明,黄振威.“枫桥经验”的原生基因优势及其新时代实现方式[J].社会科学,2025(2):81-93.
- [5]张彦,李汉林.治理视角下的组织工作环境:一个分析性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20(8):87-107,206.
- [6]党秀云,胡乘铭.志愿服务嵌入社区的情感治理分析[J].理论探索,2024(1):81-87.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Embedded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LIU Qing-shun, WEI Qiang

(Jiyang College, Zheji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Zhuji Zhejiang 311800, China)

Abstract: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in the new era, is a key link in achieving social harmony, stability, and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ractice in building a pattern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ed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on-site interviews, we explored the mod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participation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Zhuji City, as well as the achievements, experienc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and sustainably embed into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is is manifested in a trend of fragmented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logic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forming and operating through grassroots governments’ “leveraging” and “relay”, innovative paths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governance are proposed, including political embedding, institutional embedding, relationship embedding, and emotional embedding, among other multi-party win-win soci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models.

Key words: “Fengqiao Experience” in the new era; social organizations; social governance; embedding theory

(责任编辑:桂杉杉)

(上接第105页)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教高[2020]3号)[EB/OL]. (2020-6-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2] 梁伟,马俊,梅旭成. 高校“三全育人”理念的内涵与实践[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4):36-38.

[3] 张雨尘. 艺术教育融合非遗传承的美育创新路径分析[J]. 大观(论坛),2024(11):127-129.

[4] 高德毅. 课程思政:有效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的必然选择[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1):31-34.

[5] 吴均. 协同理论视域下高校大思政课格局的构建探析[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2(1):95-100.

[6] 苏庆敏,魏芯. 国内外课程整合研究动态回溯与展望[J].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3):56-58,144.

[7] 田静.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内在逻辑与建构路径[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38(5):124-126.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rt Vocational Colleges

XU Yu-juan

(Suzhou Art and Design Technology Institute, Suzhou Jiangsu 21510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reat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framework of the new era, art vocational colleges confront the dilemma of dichotomy between professional skill cultiva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shaping. Guided by the “Tri-comprehensive Education” principle, this study focuses on constructing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s for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in art vocational institutions,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practical challenges including superficial curriculum integration, insufficient faculty collaboration, and misalignment between educational and industrial objectives. The proposed three-dimensional synergy framework encompassing “stakeholder engagement—curricular systems—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s” demonstrates innovative pathways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research teams, explicit-implicit integrated curriculum frameworks, and school-enterprise-community resource integration. This research pioneers a bidirectional convergence model achieving both “infusing professional creation with ideological-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artistic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s featur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and red culture-inspired creative development validate the efficacy of this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in enhancing students’ cultural literacy and social value internalization.

Key words: art vocational colleges;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ri-comprehensive education

(责任编辑:陈思婷)